

中国社会学
经典文库

(修订版)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学
经典文库

(修订版)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著

Copyright © 2018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书新增地图（Pxlil）的绘制底图来自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民政局公布的北京市域地图，审图号：京S（2016）0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 项飙 著.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3

ISBN 978-7-80768-188-5

I . ①跨… II . ①项… III .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

北京②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研究—浙江 IV .

① C912.81 ② 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9570 号

丛书策划 杨震林

责任编辑 苏毅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5

字 数 419 千字 图 26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一（修订版序） 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跨越边界的社区》原版成书于1998年，2000年出版。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我第二次修改的结果。第一次是在2001年。当时为了准备英译本，在刚刚经历了被西方学术规范全面震撼的我，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①我把大量细节断然抛去，认为它们没有理论意义。我觉得自己做那些琐碎描述是因为缺乏规范训练，是缺乏高度概括的学术能力的体现。我这次修改用的是2001年那满页是羞愤的删除号的手改稿。但这次的一个主要工作却是把那些粗重叉叉下的细节抢救回来。

放下了一些理论焦虑，蓄起了一点历史视角，我重新体会到细节的价值。首先我意识到，我当年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理论才求诸细节。如果我们把理论理解为劝说读者的工具，细节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我希望通过充分的细节来说服读者：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我当年那么投入地整理记录细节，是觉得一个新的历史在自己眼前形成，我被其鲜活生动深深吸引，强烈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些细节。细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但是各个细节都是有“道

① 英译版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Zhejiangcun: the Story of A Migrant Village in Beijing*. Jim Weldon 译，荷兰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于2005年出版。2001年修订时，我正在澳大利亚为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进行对印度籍计算机工程人员的调查。关于我当时的学术迷惑，读者可参阅《一个陌生者的探险》，《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理”的，即细节展示人们怎么行动、什么行动导致什么结果的逻辑。

记下那么多细节，也是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读者和“浙江村”之间的中介。我不掌握“浙江村”的所有事实，也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想做的，是把读者带到“浙江村”。我希望读者通过看我怎么和“浙江村人”互动，读者能够直接地接近他们。整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双重对话：我和“浙江村人”的对话，和以此为基础的我和读者的对话。我希望保持对话的开放性，让读者进入我和“浙江村人”的互动、进入我的思维过程。没有细节，就没有对话的展开。我在新版中也保留了曾经删去的非学术性的（比如政策建议、社会评论式，及个人感受的）语言。这些思考和感悟当然是粗浅和芜杂的，但是它们是开放性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为当时的细节记录是基于这样的冲动，近二十年后重读，不但依然可以触摸当时跳动的脉搏，反而感到了更大的冲击力。在调查中，这些细节是令我惊讶兴奋、追着捡拾的彩珠。在2001年它们看似满地杂草。而现在，这些细节又像是从泥土深处探出的芽头，零乱但是包含着坚挺的生命，让我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東西。

比如，我在2001年把对生活体系的描写（第六章）基本上都删去了。但是现在看来，人们怎么买菜、看病、养小孩等等，可能比他们怎么做生意更为重要。“浙江村”把物质生产（做服装）和人的生产（生活体系）用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两个体系的重叠是它独特的生命力所在。“浙江村”首先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体。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其生活体系是辅助经济活动而存在的，就像我们的吃喝拉撒在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服装生意无非是这个社会自我延续过程的一部分，就像只有了解了人们怎么吃喝拉撒，我们才明白“工作”对他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浙江村”在2000年以后的变化的重点，并不在于其经济活动；而其生活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居住大院的消失和依靠外部市场来满足

教育、医疗的需要，可能更为重要。

又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详细记录了社区内非正式权威形成的复杂过程，包括大人物和帮派、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发形成的权威具有暴力和掠夺性的一面，但是通过在社区内部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作为居住和生产空间的大院），草根权威出现良性化的趋势。最有威望的大人物成为打击帮派势力的主要力量，并且和基层政府积极互动。“浙江村”这二十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大人物的草根性的减弱。对新式精英来说，群众威望不再那么重要，而财富和体制给予的光环是他们追求的目标。重读历史细节让我意识到，新式精英的草根性的减弱，不能理解为劣绅对良绅的取代，更不是现代对传统的更替，而是因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坏了。由于自主性的破坏，体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强的社会吸纳能力。新式精英因此紧随体制，而他们发展群众基础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如老的大人物了。

我之所以重新体会到这些细节的价值，也是因为我对我和“浙江村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跨越边界的社区》送给任何“浙江村”的朋友，因为我对大部分人的描写都强调他们的多面性，没有丝毫的颂扬成分。而且主流社会和体制是我心目中的阅听人，因为我想要的是改变他们对“浙江村人”这一类流动人口的看法。我从来没有想过“浙江村人”会去读它。但令我惊讶也最令我特别欣慰的是，许多“浙江村人”买了这本书，而且一买就是几十本。到2016年还有朋友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浙江村人”在书里看到了他们自己。我猜想，是细节让他们和文本建立了真实具体的关系。同时，旨在讲道理的细节使他们看到自己行动的意义。他们看到自己不仅仅是生意人、是被驱逐者，而且是和主流社会的对话者。

高建平（见第八章）是今天“浙江村”最重要的精英人物之一，他准备借北京的疏解计划在河北再造一个新“浙江村”。巨大的计划也面临巨大的压力。2016年他希望我在公共媒体上为他的项目论证，

向北京和丰台区政府提出有利项目的建议。我坦言我做不到。我说他的项目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我的工作只是细致地记录他的所为，多少年以后，别人可以从他的成功或者失败里看出新的道理，因为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看着我严肃地说，“你下次来北京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这是令我感动的一刻。平时他们似乎只关心眼前项目的成败，强烈渴望得到政府的认可，但是他们也渴求看到自己是一个历史主体，看到成败背后的道理，看到自己和社会整体的关系。他们希望看到饱满的自己。

在这次修订版里保留这些细节，也是我对当年的研究方式的纪念。我之所以能够在“浙江村”毫无计划地泡六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还没有被正规化。学校里既无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发表的要求。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如我在书里所说，“‘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用以写文章的题目”。（2000：521）本书新版的序二从经济社会“正规化”的角度分析了“浙江村”的变化，而社会研究领域的“正规化”也是这二十年一个重要的变化^①。基金申请指南、A类刊物要求，框架、假设、文献回顾……黏稠的术语和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在这些正规化的文本里，不仅社会行动者看不到自己，连研究者也找不到作为活人的自己。近来兴起的底层书写是文学界和思想界对这一趋势的弥足珍贵的纠正，但是在这些文本里，底层者多以个体的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立体的、群体性的历史主体的身份

①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读者可参阅拙著《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2015年12月号：70—79。

站出来。多有感人的叹息，少有勃发倔强的生命。这样的文本可能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众自己想看的。^① 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这次修订工作的本身，也都是关于细节：核实细节信息、纠正错别字、调整不通顺的句式、统一前后不一致的格式。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北京三联书店的苏毅编辑及其同事们一丝不苟的工作。在一切似乎都在泡沫化的今天，他们这种细节精神尤其让人感动。

除了这篇“修订版序”外，新版中加入了序二和序三。这是为了向读者交待：二十年前的这些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参考价值？我为此在2015和2016年三次重访“浙江村”，同时结合以前的重访，写成了序二，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中国社会在这二十年间并没有历史断裂，甚至没有大的事件，但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从入学到求职到就医到婚恋——许多规则都已大不相同。有些变化在形式上是我曾期望的，但是其实际效果往往出乎预料。有些变化则和原来的预期大相径庭。《跨越边界的社区》里记载的诸多细节，显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那么，为什么一种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今天是否还存在多种可能？我当初为什么会形成那种期望，今天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期望的落空？本版不能对此展开讨论，但是我希望读者带着这些问题去读这本书。序三是我在2003年为英文版所作，对当时的户籍改革方案作了回应。希望这也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线索，以便对本书作更好的历史性的阅读。

① 关于笔者对西方近来“受苦民族志”的评论，及民族志分析如何参与社会变化，可参见《我们如何叙述当下、进入历史：兼论人类学的现实角色》，《考古人类学刊》（台湾）2015年12月号（第83期）：89—102。

原版录用的照片，在多次搬家中遗失，此版正文中用的照片是我在同一时期（1992—1998年间）拍的。

在新版书的末尾我也加了“索引”。索引是邀请读者进入文本，或者在读完之后从另一个角度体会细节的一扇后门。读“目录”像是在远处看房子，你看见房子有几层、占地多大、大概是怎么搭建的。索引则通过关键词，展示了书里涵盖的具体话题，比如社会网络、地方政府行为等。这些主题往往是散布在各章节中的，同时，同一段落中又可能包含不同的主题。索引把镶嵌在民族志细节中的多个主题勾勒出来。索引也是把一座房子和其他房子联结在一起的过道。索引选的关键词，是我认为知识界及公众关注的话题，比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关系等等。书里不一定对它们展开专题分析，但是提供了独特的素材。索引可以帮助关注这些话题的读者查找相关的细节，看到本书和其他文献的联系。（可能正是这个原因，索引里最常用的条目是人名、地名、特别事件等专有名词。对历史、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学科来说，这些专有名词是把知识系统化的节点。）如果说目录展示了一株树如何自成一体，索引则让我们从一棵树里看到一片林。

由于这样的理解，本书的索引突出概念化的主题。比如，我把劳务中介、工资、带班人等都归在“劳动”这一目下；把承包、联营、下岗等归入“国有企业改革”这一范畴。我同时特意选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主题，比如联络处、保安、清理（外来人口）。这些议题可能还不是社会科学界广泛使用的关键词，但是它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和当今比较重要，也有特色的现象。这些问题也经常在别的研究中被提及。让这样的潜伏的主题呈现出来，和别的研究的潜流汇合，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出比较扎实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来。

最后我要交待一下关于我的名字的细节。我多年来署名“项飏”，护照上也是这么写的。可是最近发现，我在温州老家户籍本上

登记的是“项飙”，从而新的身份证必须是“飙”。否则，公安部门告诉我，我将会有不断的麻烦。所以本版署名“项飙”（但是在引用我以前的出版物时，包括本书原版时，将使用原来署名样式）。这也算是中国社会管治正规化的一个例子。作为人口管理对象的项飙现在有了一个明确、连贯的记录，但作为作者的我，不得不对我四十多年来的文字生命说一声沉重的再见。

2017年6月于东京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①

中国大陆社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越来越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 21 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多时曾达到近十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

^① 本文的初稿是以“泡沫、盘根和光环：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为题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2016 年 2 月 19 日）。修改稿发表在《二十一世纪》2017 年 2 月号：81—97。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年11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①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我这样预期是因为，首先，在市场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浙江村”经济将上规模、上档次。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层次的政府

① 新社会空间是《跨越边界的社区》描述“浙江村”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显然受20世纪90年代当时关于“市民社会”讨论的影响，带有目的论的色彩。当把它和张鹏教授对“浙江村”的出色研究相对比，其局限就尤其突出。张鹏的研究也以空间为核心概念，但是其含义完全不同。受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影响，张鹏强调物理空间如何成为权力斗争的场域。我的笼统的社会空间是和国家相对的，而张鹏强调国家、社区领导者、普通工商户三层间的复杂庇护关系。我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关注权力的多层关系，而强调社区和国家的两分呢？这并不是我没有看到权力的多面性——我自己是当年“浙江村”和政府互动的一个中介，我在乐清县（市）驻“浙江村”联络处帮忙、组织爱心小组、为他们联系媒体、起草给政府部门的信件等等。我对空间概念的简单化应用，首先可能是一个实证判断问题。张鹏强调的庇护关系在酒桌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当政府官员、“浙江村”的大人物和普通工商户坐在一起，谁大谁小一目了然。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大人物在当时主要对下（普通工商户）负责，这是他们的权威基础。地方政府固然可以轰赶外来人口，但是他们在具体运作中经常是被动的，不断在妥协。同时，我的研究本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建设自主性社会的努力的一部分，其目的不是为了和现有理论对话；关心的是有没有形成新的结构性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物理空间的分析性意义。见 Li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张鹏著，袁长庚译，《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认可。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我在当时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京温市场）和“浙江村人”兴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区（JO 大院）里帮助组建了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就是希望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①

二十年后的“浙江村”显然“正规化”了。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用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年北京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 CBC（Clothing Business Center）。^② 2016年我第五次重访“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

① 我这样的行动指向的研究可能也造成了 Charles Hale 所说的“分析上的封闭”。行动指向的研究希望在当时当地对问题作明确的判断，而不进行超脱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对总体形势的把握，而不是微观上的分解；要的是建设，而不是解构。行动指向不把一个现象转换为理论上的开放性问题，所以“封闭”。这样，可写的东西不多，写出来的也可能被认为是带有目的论、化约论色彩的肤浅描述，难以和文献对话。但是二十年后的回顾让我意识到，也许正是“分析上的封闭”，给研究带来了某种“历史的开放性”。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当时的“封闭式”的判断，它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我们当年理解的局限，看到历史轨迹如何难以预测，从而逼迫我们反思。正是因为它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和痕迹，它可能成为进一步思考的一个基石。袁长庚先生对这一“历史的开放性”作了精到的描述：“《跨越边界的社区》是 indexical 的，它的问题意识、关怀、文本之外的政治诉求甚至研究者参与其中的方式、路径，都全然是那个时代‘中国的’问题。抛开学术上艰深的讨论不言，它始终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始终可以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再次返回那个时刻。”他同时认为《跨越边界的社区》所体现的行动指向和历史感是中国大陆 20 世纪 90 年代的学术作品的一个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学者的风格的继承。（2016 年 6 月 8 日、10 日致笔者电子邮件。）Charles Hale, “Activist Research v. Cultural Critique: Indigenous Land Right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Politically Engaged Anthrop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1, no. 1 (2006): 96-120.

② 北京大红门服装协会 2008 年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区介绍”：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wq/2008-12/30/content_15321309.htm。（2016 年 4 月 1 日最后阅读。）这么介绍大红门商贸区：（转下页）

谈时，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边做笔录。在社会生态上，违章建筑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后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① 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②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 1995 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

（接上页）商贸区内汇集了大批江、浙、闽、粤和港澳服装巨贾的资金与货源，……39 家大型服装、纺织品市场，营业面积约 100 余万平方米，货物日平均吞吐量达 1600 吨，年交易额占全市同类商品交易额的一半以上，50 000 余家商户在此经营，服装纺织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100 000 人。在北京重点发展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区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华北乃至国内外闻名的以服装批发业为主导的服装商圈，是丰台区重点发展的四大主体产业之一。

- ① 到 2015 年，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来到北京的“浙江村人”的大部分人歇业回温州老家。“浙江村人”的职业生涯是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决定的。人们一般在第三代出生的时候即歇业。温州人管歇业叫“站起来”，而全身心地工作叫“躺下来”（或者“倒进去”）。躺下大干、起身不干，这也许体现了温州人对网络关系的敏感：重要的不是你自已干不干，而是是否全身进入网络。关于他们的子女，我在《跨越边界的社区》（2000：508）提到在北京接受了教育的温州青少年出现“回归”“浙江村”的趋势。跟进调查显示这个问题也比原来理解的要复杂。对现在已经成年的子女而言，“浙江村”里的同龄人是他们重要的朋友圈子（对男性尤其如此，他们称为“发小”），但是在就业上，很少人子承父业留在“浙江村”。成功的“浙江村人”对子女的普遍期望是大学毕业后进入国企或者大型外资企业。
- ② 新近类似观点可见李琼英，《从并存到同化：一个中国移民村的变迁之路——以北京“浙江村”为例》，《江淮论坛》2013 年第 2 期：136—141。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道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道，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基于对当时“浙江村”的观察，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曾这样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2000：499）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黄宗智指出，中国城镇 50% 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① 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首先，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其次，非正规经济被吸纳到正规经济中来，在形式上成为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头带老乡可以随便找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执照和资质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正式注册的劳务公司揽活儿。派遣工制度、层层外包、企业以“实习”名义利用技校学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

①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 年第 2 期：51—73。

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 and 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① 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包装，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机构（比如劳务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比如大型企业和正规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规经济），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规经济），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代政府管治社会的主要手段。套用 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热门词，正规化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规化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这一进行中的正规化过程很难被概括成一个公式化的图景；对“浙江村”个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纠结。^②

“分割—攫取”模式

“浙江村”的正规化不能被理解为是“现代”对“传统”的替代，

① 郭宇宽，《资本的屏蔽还是权力的屏蔽？——“包工制”的理论纵深和中国实证》，《领导者》2011年8月总41期：162—167。

② 在1998年完成《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后，我和“浙江村”的朋友一直保持联系，并于2003、2005、2015和2016年共五次重访“浙江村”，进行个别深度访谈和小组讨论。我也在英国和日本访谈了在“浙江村”出生、现已成年的第二代“浙江村人”。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分割—价值攫取”的发展逻辑下来考察。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这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浙江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偷偷离家到边远地区讨生活，是对这一体制的逃避和反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①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的一个社区来，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②这是“浙江村”为什么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自主性、难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1995年之后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比如北京市

① 汪建华等将之概括为“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见汪建华、郑广怀、孟泉、沈原，《在制度化与激进化之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总第150期）：4—18，页4及注2。此外参见 Claude Meillassoux, *Maidens, Meal and Money: Capitalism and the Domestic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飏，《“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56—67。